

## 皖南事变后的国共宣传战

卢毅

(中共中央党校 中共党史教研部, 北京 海淀 100091)

**[摘要]** 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共两党进行了一场激烈的宣传战,双方都努力运用舆论工具,使形势朝着有利于己方发展。一方面,国民党将事件限定为军纪问题,淡化其政治色彩,企图息事宁人。这种自我辩解并非全然无功,在相当程度上还是影响了一些媒体。另一方面,中共则不断展开宣传攻势,以争取舆论同情,且其立足点已不限于事变,而是要求政治上通盘解决。在此过程中,中共宣传技巧的熟稔得以充分展现。两党的这种宣传交锋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国民党最终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困境,而中共则借此大大提高了威望,皖南事变也由此成为抗战时期国共政治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一大转折。

**[关键词]** 皖南事变; 国民党; 中共; 舆论; 宣传

**[中图分类号]** K265.22;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801(2018)03-0076-10

**DOI:**10.14119/j.cnki.zgxb.2018.03.011

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新四军军部及其直属部队9000余人在转移途中遭到国民党重兵的突然袭击,除2000余人分散突围外,少数被俘,大部牺牲,军长叶挺被扣,政委项英遇害。事变发生后,国共两党进行了一场激烈的宣传战,双方都努力运用舆论工具以争取其他力量,使形势朝着有利于己方发展。关于这一问题,以往学界虽已有一些研究,但大多集中于论述国共对事变各自采取的对策,而从舆论宣传的角度对其技巧与成效加以分析的成果则不多见。本文拟就此做一番探讨,以求进一步拓展和深化该问题研究。

### 一、国民党的辩解与成效

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方面于1月13日以朱德、彭德怀等人名义发表抗议通电申明:“我八路军新四军前受日寇之扫荡,后受国军之攻击,奉命

移防者则遇聚歼,努力杀敌者则被屠杀,是而可忍、孰不可忍?”并表示:“敬恳中央立解皖南大军之包围,开放挺等北上之道路,撤退华中之剿共军,平毁西北之封锁线,停止全国之屠杀,制止黑暗之反动,以挽危局,以全国命,……临电悲愤,不尽欲言。”<sup>[1]</sup>激愤之情溢于言表。

面对中共的强烈抗议,国民党不得不有所回应。1月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通令,宣称新四军“违抗命令、不遵调遣”,因此“着将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番号即予撤销”,“借申军纪,而利抗战”。同日,军事委员会发言人也发表谈话称:“此次事件完全为整饬军纪问题。新编第四军之遭受处分,为其违反军纪,不遵调遣,且袭击前方抗战各部队,实行叛变之结果。”在这一谈话中,国民党还指责新四军“自奉令开动时,即决意不遵令北调,早已定谋,移赴苏南……期于短期内,掌握京沪杭三

**[收稿日期]** 2017-12-19; **[修回日期]** 2018-01-02

**[作者简介]** 卢毅(1971-),男,浙江平阳人,历史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角地区建立根据地”，故不得不予以剿灭<sup>[1-2]</sup>。这种将事变定性为军纪问题的论调，无疑是为自己辩解和开脱，以求师出有名。当晚，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出指令，要求各报社原文转载上述通令和发言人谈话，不许更改，同时配发社论，以配合宣传。

根据这一定调，国民党的宣传机器纷纷开动，极力渲染中央处理皖南事变之不得已，并强调与政治无关。1月18日，《中央日报》发表社论说：“我们相信这次军事最高当局处理这事变，一定比我们更痛心、更惋惜。其心理与诸葛孔明挥泪斩马谲，正复相同。新四军擅自行动，是反抗军令、破坏军纪的重大问题，这不但与政治问题无关，而且与其他部队也风马牛不相及，责任完全在叶挺、项英几个人身上。”<sup>[2]</sup>23日，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机关报《扫荡报》也发表社论，仍是从军纪角度加以解释：“诸葛武侯斩马谲，则以马氏违反军令”，“韩复榘、石友三等辈破坏军纪，天下皆曰可杀”，“这次苏皖境内有一部分军队违反军令，擅自移动，罪在该军少数负责将领身上”<sup>[3]</sup>。同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青团中央联合发出宣传要点，要求各级党部宣传机关对皖南事变的宣传应注意两点：“一、此次事件纯出于皖南新四军之不遵命令，攻击友军，在纪律上自应受相当之制裁，乃纯粹军纪问题绝不含政治的或党派斗争的意义。二、军纪之执行以行为为根据，此次违抗命令破坏军纪者只新四军，各言论机关，如有评述，应以新四军为范围予以评述，对中共及十八集团军可勿涉及。”<sup>[4-1]</sup>这个指示，一方面坚持所谓“整饬军纪”的说辞，另一方面也流露出其不欲将事闹大之意图。

1月27日，蒋介石在国府纪念周发表长篇讲话。这是皖南事变以来，重庆当局最具权威性的一次政策宣示。不过，蒋的基调仍是把事件定性为军纪问题，淡化事件的政治色彩，企图息事宁人。他说：“这次新四军因为违抗命令，袭击友军，甚至称兵作乱，破坏抗战，因而受到军法制裁，这纯然是为了整饬军纪。除此之外，并无其它丝毫政治或任何党派的性质夹杂其中。”<sup>[4-2]</sup>显而易见，该谈话仍不脱自我辩护的窠臼。

那么，国民党的这种自我辩解是否起作用了呢？长期以来，人们往往认为皖南事变发生后舆论界都是站在共产党一边，一致谴责国民党，“一切同情到了我们方面”<sup>[1-3]</sup>。事实上，当时国内尤其是国统区舆论界对事变的态度错综复杂，并非完全一边倒。西南联大教授潘光旦曾撰文说：“在所谓新四军事件发生以后，大学里很大一部分的忠公体国的青年，或在壁报上，或在座谈会里，或在朋友谈话之间，发表了不少义愤填膺的议论，最大的目的是在统一，在谴责违反军令与政令从而破坏统一的人。”<sup>[5]</sup>显然，有不少青年学生还是支持国民党的。至于舆论界，情况则更复杂。1941年1月19日，《新华日报》发表一文就指出：“江南惨变，亲痛仇快，而军事委员会通令与其发言人及重庆中央、扫荡、益世、商务、时事各报纸则对新四军任意诬蔑，曲解时事，混淆听闻。即较公正之报纸在言论统制之下，亦不能揭露阴谋，发表公论，致黑白不分，沉冤难明。”<sup>[4-3]</sup>由此可见，当时媒体并非全然同情中共。这种历史的复杂性，还可从《大公报》《新蜀报》等国统区报刊的相关报道看出来。

1月17日国民政府军委会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后，因事发突然，未及了解真相，素来严谨的《大公报》并未立即表态，仅于次日遵令转载了中央通讯社的消息。直至21日，《大公报》才发表社评《关于新四军事件》。这篇社评一方面肯定了事件的最终发生，“就军纪军令以言，统帅部的处置是无可置议的”。这无疑是接受了所谓“整饬军纪”的说法。另一方面，该文又称赞中共在西安事变时的表现“是极合乎国家民族利益之公的”，并声明：“就政治观点以论新四军事件，这部分军队原质本有微异，而且是抗战发动后才加入国军的战斗序列的，我们虽不必请求政府对之另眼看待，却极希望统帅部之慎重处理，于整肃军纪之外，不可偶或渗入感情的成分。我们恳切希望叶挺氏个人能邀得宽大的处分，更恳切希望中央小心翼翼的处理此问题，勿使有节外的牵连与蔓延！”<sup>[6]</sup>似乎对中共又不无同情。总之，《大公报》最初态度可谓不偏不倚，基本站在中间立场。

《新蜀报》也是抗战时期在重庆影响较大的一份报纸,与中共素有交往。1月17日晚,《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编辑部主任石西民等亲到《新蜀报》编辑部,说明皖南事变的经过,希望《新蜀报》不转载国民党中央社消息,或登在不重要的地位,不写社论。《新蜀报》同仁分析:“我们是中间报纸,不能像《新华日报》那样拒绝刊登中央社的消息,但又不愿意违心地报道与事实不符的消息。研究的结果是在标题上作文章。对中央社所发消息标题的前半句‘抗命叛变’,我们不用,只用了标题的后半句‘新四军全部解散’。”<sup>171</sup>平心而论,这确是一个巧妙的折中之策。但很快地,《新蜀报》便因未及时配发评论遭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兴师问罪,社长周钦岳不得不找主笔来商量,并主张“泛泛地谈”<sup>172</sup>。21日,《新蜀报》在第三版国内外要闻和广告之间登了一篇300多字的短评《肃军与抗战》。短评一方面依照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口径,说这次事件只是军队纪纲之整饬,与其他一切无关;另一方面也提醒大家要防范敌人的阴谋,更要加倍集中自己的力量,以争取抗战之最后胜利,并希望这类痛心的事件,今后永远绝迹<sup>173</sup>。从这些不痛不痒的文字来看,此文显系敷衍了事,应付国民党。

但蒋介石1月27日发表讲话后,许多报刊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29日,《大公报》以几乎整版篇幅刊登了蒋介石的谈话,并发表拥护这一谈话的社评。在这篇题为《整饬军纪准备反攻》的社评中,已全然不见同情中共、劝诫国民党的言辞,相反却一再强调:“国家的军队,组织要一致,意志要齐一,军令要统一,尤其在战时,需要国家统帅大权的至高无上。听命遵纪,是军队之常;否则违命犯纪,便是失常。失常之事,最好没有;假使不幸发生,国家予以制裁,是当然的。”该文还认同蒋的说法,将新四军与韩复榘、石友三等军阀相提并论,并表示:“希望今后我们的军队万万不再发生违命犯纪之事!”<sup>174</sup>

《新蜀报》也一改此前的消极态度,发表了题为《再论新四军事事件》的社论,对蒋介石谈话赞赏有加。社论开篇指出:“读蒋委员长二十七日国民

纪念周训词,滔天朗朗,全国人民从此可以释下这一沉重的担子。”并完全肯定蒋介石谈话中的内容,认为“政府制裁新四军纯是为了军纪之整饬。这一次新四军事事件,也不过政府制裁违反军纪部队事例之一,毫无特异新奇之处,更谈不到含有丝毫政治意味”。该社论最后还表示:“全国军民都应当在一个旗帜之下努力奋斗,相信任何部队都不会因政府整饬军纪而离心离德,不然将是千秋万世的民族罪人!”<sup>175</sup>语气之严厉和态度之积极,与此前大相径庭。

由上可见,皖南事变发生后,《大公报》《新蜀报》等国统区中立报刊的态度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如果说它在1月27日前对中共尚存同情的话,那么27日后就与之拉开了距离。究其缘由,这种转变固然不无来自当局的压力,如茅盾即曾忆及国民党当时“向重庆各大报社施加压力,要他们在‘整饬军纪’问题上表态,拥护中央整饬军纪的决策”<sup>176</sup>。但与此同时,国民党的有关宣传和蒋介石27日谈话对舆论界产生的导向作用也不容忽视。《新民报》负责人陈铭德、邓季惺后来便坦承,他们发表拥护国民党的文章,“虽是奉命发言,同时也多少代表了当时我们和不少资产阶级的真实思想”<sup>177</sup>,可见其中仍有自愿因素。特别是蒋介石这次谈话回应了外界的一些议论,他说:“新四军事事件的处理,本是极平常极普通的一件事,也是我们抗战治军中必要的处置,所有一切夸大的宣传和恶意的推测,乃至企图耸动国际视听的谣言,我敢说完全是出于敌寇日阀之所为。”<sup>178</sup>这就消除了人们对国民党即将投降日本的顾虑。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民党的自我辩解或许并非全然无功。

## 二、中共的舆论反击

对国民党拒绝认错、反而指责新四军抗命叛变的说法,中共是绝不认可的。在他们看来,“新四军是积极抗日的,北移是服从命令的,现在得着的是被消灭,被宣布为叛变与被交军法审判。一切理由都在我们方面”<sup>179</sup>,所以必须予以坚决反击。当然,在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的应对方针也

经过了一个从政治上、军事上的全面大反攻改变为军事守势、政治攻势的过程。最后，毛泽东决定将舆论宣传作为打退国民党反共高潮的重要手段，认为“击破反共军，十分之七靠宣传”<sup>[14]</sup>。

早在1941年1月13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就联名致电八路军和新四军指出：“周、叶正在重庆抗议，我们正用朱、彭、叶、项名义发出抗议通电，……对皖南事变应公开宣传。”<sup>[15]</sup>18日，中共中央又向全党发布《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要求各根据地调动一切宣传工具和形式，揭示事变真相，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随后，中共在各地发起了凌厉的宣传攻势，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军民纷纷举行集会，发表通电，谴责国民党制造内战破坏抗战、制造分裂破坏团结的举动。重庆《新华日报》也愤然刊登了周恩来悼念江南死难烈士的题词和挽诗，当天报纸销量从平时的1000份猛增到5000份。

在这场宣传战中，有几个特点是值得注意的，充分展示了中共宣传技巧的熟稔。

其一，宣传目标明确且远大。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共双方对事变的性质分别做出界定，国民党判定为军纪问题，中共则认为是政治问题。这实际上争论的是事变责任应由何方承担。按照国民党的说法，既然是军纪问题，那责任当然在新四军，因为它违抗北上命令，擅自向南移动。而在中共看来，这完全是政治问题，是国民党借此打击中共。因此与国民党企图将事变性质局限于军纪问题相反，作为受害者，中共努力将事态扩大，以争取舆论的同情。

1月17日国民政府军委会发言人的谈话和1月27日蒋介石的演讲，都试图将皖南事变定性为个别事件和纯粹军事问题。针对这一论调，中共及时调整并统一了宣传口径。1月18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中专门就宣传工作提出了要求：“在宣传鼓动工作中，应无情地揭露国民党当局自抗战以来对人民、对革命分子则肆意压迫与屠杀，对日寇汉奸则消极应付与宽容，有功者罚，有罪者赏等一切倒行逆施的黑暗的反动的方面；指出只有改革政治机构，实行民主，才能使抗战坚持到最后胜利。”<sup>[16]</sup>这显然已不限于皖南事

变，而是要求从政治上通盘解决。

1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又指出：“他（蒋介石）现在宣称目前的问题是军事问题非政治问题，是局部问题非全局问题，是内政问题非外交问题。我们必须全部揭破他的这种阴谋。必须指出他的先消灭新四军，再消灭八路军，再消灭共产党，再消灭其它人民抗日力量的各个击破政策。必须指出目前的问题是政治问题，是全局问题，是与外交分不开的问题。”<sup>[17]</sup>这更是直接反驳国民党对皖南事变的定性，宣告了自己的立场。

其二，宣传材料丰富且具有针对性。如前所述，国民党的自我辩解并非全然无功，其将皖南事变解释为军纪问题确有相当的迷惑性，一些国统区媒体亦曾附和了这一论调。所以，如果不能驳倒这种混淆视听的说法，那便无法达到争取普遍同情的效果。为此，中共方面做了精心的准备，从逻辑和事实上澄清了事变的真相，从而占据了“有理”的位置。

1月19日，在周恩来的组织下，南方局军事组撰写了《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一文，并通过各种渠道秘密散发到重庆全市的许多地方。该文概括了八个问题，逐条驳斥了国民党对新四军的诬蔑之词。其中，第一条“关于所谓新四军违反命令不受调遣的问题”，列举了叶挺、项英在答复何应钦、白崇禧的“佳电”中已公开表示江南新四军部队可全部渡江北移，而且大部已于1940年12月开始出动，陆续经苏南渡江北上的事实，来证明在这次调往江北行动中，“没有丝毫违犯上级命令之处”。第二条“关于新四军渡江路线问题”，则指出国民党指定经皖南渡江北上的路线绝无可能，“主要的是由于敌人封锁，与友军包围阻截”。新四军为了避免与友军发生冲突，要求从苏南渡江北上，这也获得了国民党方面的同意，并非违抗军令、不遵调遣。第三条“关于新四军移动的时间问题”和第四条“所谓藉端要素问题”，更是痛陈国民党拖欠、克扣新四军军饷、弹药的事实，以此来反驳所谓“藉端要素”之罪状。第五条“究竟谁打谁的问题”，则从逻辑上直截了当地质问：皖南新

四军只有军部、直属部队及其后方人员万余人,其中伤病人员即有二千余人,其余亦大多非战斗人员,“难道还能对比自己力量大约七八倍的友军发动攻势吗?”第六条“所谓要在江南建立根据地问题”,同样从逻辑上质问:既准备在江南建立根据地,为什么原在该区的第一、第二两支队及三支队一部先后开往江北而不开回江南呢?假定是准备建立江南根据地,为什么去年顾祝同、韩德勤要新四军江北部队调往江南时,新四军不趁机南下呢?“凡此种种,都说明‘建立江南根据地’之说是妄言”。第七条“叶、项正副军长与新四军部队”和第八条“取消番号与审判军长”,则针对国民党强调新四军事件的责任在于几位长官的说法,指出叶挺、项英都是抗战有功的将领,国民党也曾多次予以褒奖,而如今“还有些官家报纸,比着叶、项正副军长为韩复榘、石友三之流,这不仅是侮辱民族战士,而且是泯灭良知”<sup>[1-8]</sup>。

同一天,刘少奇也发表通报驳斥国民党的有关言论。他指出:(一)新四军确实遵命北移,此前已与国民党方面接洽沿途事宜,皖南军医院药品及伤兵员均交红十字会派人接受,存粮和印刷所器械、纸张等也交当地接收,并发表《告别皖南民众书》,这些迹象均表明新四军准备北移。(二)改变北移路线之原因,是由于国民党事先宣传新四军北上路线,引来日军和顽军的严密封锁,所以不得不经苏南转移,况且,“本来蒋及第三战区所指示路线,一条向铜陵,一条经由苏南北上,并无一定限制”。(三)所谓我方先开枪袭击友军,纯属捏造。“我军如果有进攻友军企图,则决不至如此事前毫无准备而致全军覆没”<sup>[1-9]</sup>。

以上一系列文章均写得理直气壮、义正词严,通过列举大量的事实和严密的逻辑分析,详细揭露了皖南事变的真相,极具针对性地反驳了国民党扣在新四军头上的种种“莫须有”的罪状。这些文章的散发和传播,对于澄清人们的疑惑产生了重要作用。

其三,注重宣传策略且有节制性。中共在展开猛烈的舆论攻势同时,也强调宣传应注意策

略。1941年1月18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中便提出:“在大后方应经过各种不使党的组织遭受破坏的、侧面的、间接的方式去动员舆论与群众,特别抓住物价高涨去提高人民的不满情绪到要求驱逐亲日派,改组国民政府,实行民主抗日的水平。”<sup>[1-10]</sup>这就跳出了皖南事变本身,不再就事论事,而是抓取了国统区群众最不满意的物价问题做文章,以求起到“有利”的舆论鼓动作用。

在此期间,中共在“有理、有利”的同时还十分注意“有节”,并未直接点名批评蒋介石。1月19日,毛泽东与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彭德怀、刘少奇等人,对皖南事变后的应变措施作了指示,明确提出:“我们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采取必要步骤。在政治上全面揭破蒋之阴谋(但暂时不提蒋名字)。”<sup>[1-11]</sup>20日,毛泽东又致电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指出:“八路军人员暂时亦不发表反蒋言论。”<sup>[1-12]</sup>25日,毛泽东再次致电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提醒:“蒋现尚未提及八路与中共,故我们亦不提及整个国民党及中央军,八路及中共人员亦不公开出面,看蒋怎样来,我们便怎样去。”<sup>[1-13]</sup>

28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在《关于皖南事变后新四军行动方针致刘少奇等电》中又强调:“惟在蒋没有宣布全面破裂时(宣布八路军及中共叛变),我们暂时不公开提出反蒋口号,而以当局二字或其它暗指方法代替蒋介石名字。”<sup>[1-14]</sup>29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同样指示:“在蒋介石没有宣布全面破裂以前,在他还只是宣布所谓新四军叛变,没有宣布所谓八路军与共产党叛变以前,我们亦不公开提出反蒋口号,而在公开发表的文字中则用当局字样或其他暗指办法,代替蒋介石的名字。”<sup>[1-15]</sup>30日,总政治部也致电八路军、新四军各级政治部指出:“中央决定目前除中央军委及新四军表示与蒋介石尖锐对立的态度外,八路军将领暂时对外保持沉默态度,不发表宣言通电演说等文件……对蒋暂时不要提打倒口号,也不要提拥护口号,在根据他的命令及演说作社论时,称他为蒋介石氏,民众团体发表文件指责政府时以当局二字代替蒋介石的名字,而中心应

痛骂日寇与亲日派联合发动内战消灭抗日军队的阴谋。”<sup>[15]</sup>

应该说,中共中央这一决策在其掌控的部队中是得到坚决贯彻的。彭雪枫即曾多次强调:“在政治攻势中,我们一打一拉的,没有提出‘打倒蒋介石’与‘组织新中央’的口号,这就是我们的‘限度’。”<sup>[16]</sup>而这种既针锋相对又有理有利有节、富有灵活性的斗争策略,显然为此后局势的缓和埋下了伏笔。毛泽东后来就总结:“我们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政策,对于打退这次反共高潮,是完全必要的,且已收得成效。”<sup>[17]</sup>

其四,宣传范围广泛且特别注意国际宣传。1941年1月12日,刚刚获悉皖南事变的周恩来就发动中共在重庆的工作人员四出向国民党元老和抗战派、国共以外各党派、文化界、外交界和新闻界揭发何应钦、白崇禧的反共阴谋<sup>[18]</sup>。28日,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又指示港沪地下党组织:“利用各种矛盾一切可能,有计划地发动对国际、中国内地、敌战区的宣传工作,应是当前很重要的任务”,尤其是应“用侧面的间接的各种方法(如利用英美策动国际舆论,运用中日矛盾在敌伪报纸透露部分真的消息,发动中间分子各界人士用各种方式、不同语调、不同立场主持公道或印发小册子等),动员舆论,公布真象”<sup>[1-16]</sup>。

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人员以上海同胞的名义致信美国在沪报纸《密勒氏评论报》,驳斥国民党的有关宣传。该信针对国民党对事件的定性明确提出:“我们对重庆方面所称此次事件是单纯的军纪问题的说法,不能满意。在亲日派的阴谋下,这次事件不能不是政治问题。……我们以为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军纪问题,而是‘反共’‘亲日’阴谋的一个表示。”同时指出,皖南事变的发生“削弱了抗战力量,同时也就是大规模内战开始。结果,日本就能在中国事件上为所欲为,和希特勒进攻英国相配合,并实行南进。因此,这个问题不仅有关中国人民,也和一切民主国家人民有关,特别是和英美的侨民有关”<sup>[14-5]</sup>。这就向国际社会分析了此事件给抗战带来的危害。

这一时期,八路军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利用国民党无力在香港进行新闻封锁的有利条件,通过在香港和东南亚华侨中有着广泛影响的国新社和《华商报》发表了大量文章,揭露皖南事变经过,引起了侨胞们的密切关注。他还通过正在香港的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报道事变真相。据斯诺回忆,“对于这次屠杀事件的详细情况,我比别的记者知道得早,是新四军的后方联络官廖承志告诉我的”,“当我知道这个消息属实之后,我决定把它报道出去”,虽然“我的报道不可能通过重庆的新闻检查,因为重庆的官员矢口否认此事有任何根据。但是我还是能通过香港发出几则电讯”。他还说:“由于我的报道,我在重庆的同行记者都受到查问,伦敦和华盛顿则要求它们的使节立刻作出报告。……后来我才知道华盛顿对这些电讯极感兴趣,以致它中断了向中国提供一笔新贷款的谈判,摩根索先生(美国当时的财长——译注)甚至明确表示,如果重开内战,重庆就别指望从美国获得更多的财政援助。”<sup>[19]</sup>

此外,早在1940年12月国共关系十分紧张时,周恩来就交给另一位美国著名记者斯特朗一份长达26页的文件和资料,并嘱咐她暂不发表,将来等通知再发。1941年2月初,已回到美国的斯特朗接到通知,立即用这批材料在《先驱论坛报》发表了一篇文章<sup>[20]</sup>。不久,她又发表了《不适时之中国奋斗》和《中国国共两党的危机》等评论文章,与斯诺的信息相互印证,颠覆了国民党对外界的宣传,在美国各界引起了巨大反响。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南方局和《新华日报》还安排专门人员准备材料,通过不同途径送给各国新闻媒体驻重庆的记者,并安排南方局外事组的王炳南、王安娜、龚澎等人冒着生命危险逐一造访各国使馆、记者,向他们说明事件的真相。龚澎还作为周恩来与外国记者之间的联络员,经常“步行到外国记者招待所去,手提包里放着延安最近广播稿的复本”<sup>[21]</sup>。周恩来也亲自会见了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大使馆武官兼驻华军事总顾问崔可夫,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和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

里,以及美国记者斯特朗、白修德等人,向他们提供了国民党制造摩擦的丰富材料。由于外国记者们只能得到官方新闻发布会上对中共的攻讦消息,所以十分欢迎中共方面的报道。一些外国记者就向国民党中宣部明确表示:如果不让他们报道国共双方的观点,他们就拒绝发表蒋介石的讲话,“他们公开蔑视审查制度,将全部消息航寄到香港去发表。结果,全世界都知道了事实真相,而不单是听国民党提出的经过仔细篡改的说法”<sup>[22]</sup>。

### 三、各界的反应

皖南事变的发生和国共两党围绕这一事件的宣传交锋,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从国内民主人士的反应来看,事变发生后不久,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彭泽民等民主人士就于1941年1月12日联名致电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明确要求国民党当局“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种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sup>[1-17]</sup>。另据中共所编《皖南事变后的各方动态》报告,事变发生后,各小党派及中间派对国民党大为失望,第三党章伯钧、青年党左舜生等拟发起成立民主联合运动,要求与中共积极联合以抵抗国民党的压迫。黄炎培也对新四军表示同情,并说:“不论事情经过之是非,当局如此措置绝对错误,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无。”<sup>[1-18]</sup>

皖南事变的发生,在国民党上层也引起了轩然大波,“老党员甚至说出这样做恐至自取灭亡,国民党人员亦多忧虑愤慨,表示此事做得过火”<sup>[1-18]</sup>。当初充当和事佬的冯玉祥、于右任、张冲等人,则大骂何应钦,说何搞阴谋,骗了他们,现在让他们“没有脸见人”。冯玉祥还说:“新四军抗战有功,妇孺皆知,此次被政府消灭,政府方面实没有办法能挽回人民的反对。”<sup>[1-19]</sup>甚至连山西的阎锡山、榆林的邓宝珊、绥远的傅作义、宁夏的马鸿逵、四川的刘文辉、云南的龙云、广东的余汉谋等地方实力派,也“多数感到新四军之被解散即为解散地方势力之先声……因而表现恐慌与对我同情”<sup>[1-20]</sup>，“在此次国共斗争中都站在中间派地位”<sup>[1-21]</sup>。

海外侨界对皖南事变同样深表遗憾。据当时舆论反映,“海外侨胞从国内时局的演变和自身的经验中,日益厌恶重庆当局的‘反共’措施”<sup>[1-22]</sup>。巴拿马华侨郑华秋对记者说:“皖南事变的发生,诚为抗战以来最不幸的事件之一,而且也是最痛心的事。”<sup>[4-6]</sup>加拿大华侨黄寄生也认为:“在今天,民族公敌在前,各党派应团结一致,枪口对外。”<sup>[4-7]</sup>旅美华侨各社团亦发表通电申明:“消息传来,遂令侨胞惊惶万分,不寒而栗。良以当此国家民族危机千钧一发之际,正需团结而不暇,岂容分裂而内战。”<sup>[4-8]</sup>

如果说美洲华侨的态度尚属温和,那么南洋华侨的反应则更为激烈。菲律宾华侨看到中国共产党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小册子后,“无不万分关切,义愤填胸”,发表通电要求当局释放叶挺<sup>[23]</sup>。有些报刊则严厉抨击国民党制造分裂的行径,斥责他们“直欲扩大事态,造成全面内战,弄到国亡种灭而后甘心”,严正声明:“凡我爱国侨胞,无论其属于任何党派或无党无派者,均不愿意看见我们国家民族由分裂而灭亡。”<sup>[4-9]</sup>并大声疾呼:“大敌尚未打倒,国人仍须团结。”<sup>[4-10]</sup>有些华侨社团还尖锐指出:“事实证明,新四军问题完全不是单纯的‘军令’问题,而是国共摩擦的问题”,要求国民党政府真正实行民主政治,彻底清除出那些顽固分子<sup>[4-11]</sup>。

国外媒体的反应同样十分激烈。苏联《真理报》便表示:皖南事变“无异扩大内战,而内战唯有削弱中国而已”<sup>[4-12]</sup>。这在国民党看来,显然是“开始评责本党,谓此事系本党持狭隘之党见所致。且谓其他共产党军队亦将被政府解决”<sup>[24-1]</sup>。而英美等国的舆论界也认为皖南事变会影响到中国抗战前途与英美利益,于是纷纷予以谴责。香港英文《南华日报》发表社论指出:“甲、新四军之撤退区域闻已被汪精卫军队所占领。乙、中共的力量已经被公认为整个中国抗战力量中不可忽视的部分。丙、不管从哪一方面来观察,中共对于中国的基本要求与希望及其远见,要比保有封建的民族领袖强得多。丁、国民党还是要整顿自己内部的纪律才行。”<sup>[1-23]</sup>英国《曼彻斯特导报》也说:“解散皖南新四军事件,只有日本最为兴奋”,因此“必须以

最大努力来恢复团结”<sup>[125]</sup>。

当然,影响最大的还是外国政府的态度。但据蒋介石身边亲信观察,“同情政府之处置者并不普遍,尤其苏英美各国人士”<sup>[126-1]</sup>,他们“群以中国将发生大规模之内战为惧,且颇多受共产党方面宣传而不直政府之处置者”<sup>[124-2]</sup>。首先是当时大力援助中国的苏联。1941年1月17日,国民政府新任驻苏大使邵力子举行到任后的第一次宴会,宴请苏外交、贸易两部长及其他高级官员。外长莫洛托夫本已答应赴会,但因皖南事变消息传来,便借故缺席,以此来表达对皖南事变的反对态度。25日,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又在会晤蒋介石时称:“苏联政府对于此次之冲突与斗争,非常关怀。”并质疑:“新四军为数不过六、七千人,何敢进攻邻近之大军?”<sup>[127]</sup>苏联驻华武官崔可夫也先后质问何应钦、白崇禧等人:“现在正在和侵略者打仗,为了打赢这场战争,人民应该团结一致。何以要打自己人,要屠杀自己的士兵和军官呢?”<sup>[128-1]</sup>并暗示蒋介石:如果“他进犯共产党、调转枪口对准人民,而不是侵略者,这可能影响苏联方面提供军事援助”<sup>[128-2]</sup>。

出乎蒋介石意料的是,英美等国也不赞成国共分裂,“无论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都赞成蒋介石对共产党的军队采取敌对行动,……他们对蒋介石行动的不满是真的”<sup>[128-3]</sup>。事变发生后,他们普遍认识到“这种情况直接影响中国解放战争的前景和英美的利益”,因而“要求英美统治集团向中国统治集团施加压力”<sup>[129]</sup>。英国驻华大使卡尔面见蒋介石提出:“内战只会加强日军的攻击”<sup>[130]</sup>,劝其停止国内冲突,还以中国内战危险尚未消除为由,表示暂缓开放滇缅公路。

与此同时,美国的一些知名人士和团体也纷纷发表通电或联名致电蒋介石,对皖南事变“表示惊骇与抗议”,指出“这样的行动只会帮助日本而有损中国在美国的令誉”,希望蒋介石“谨慎处理”,“使不致使事态发展为中国的危机,轴心国远东盟友之胜利”<sup>[131]</sup>。对美国朝野的这种舆情,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驻纽约办事处主任李夏曾向国内报告说:事变发生后的几周里,“美国民众所听见的

当然只有激烈攻击国民党与中央政府的一面之辞”。他因此哀叹道:“我们这种在美负责宣传的人员,……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sup>[132]</sup>。

为了挽回国际声誉,1月18日,蒋介石致电正在美国争取援助的宋子文,希望借其在美的个人影响向美国各界作出解释。蒋介石谓:“新四军抗命谋叛,兹已将其全部解决,明令撤销其名义番号,故江南共军已经肃清,以后可无后顾之忧。共党因无实力,故只有扩大宣传,摇撼国际视听,一面以内战不利于中央名义,使中央对其不敢制裁,其实中央抗日之外,确能控制国内一切,决无他虑也。外人不明底细,易为共党诱惑,请详告各友放心为盼。”<sup>[133]</sup>但从后来情况看,宋子文的游说似乎并未奏效。2月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记载:“新四军问题余波未平,美国因受共党蛊惑,援华计划几乎动摇,子文甚以此为虑。”<sup>[134-1]</sup>显然,他这种企图通过贬低中共宣传、展示自身实力来平息舆论的做法没有获得美国认可。

究其缘由,此时美国朝野之所以充斥对国民党的不利言论,一方面虽然是出于对国共内战的担忧,另一方面也源于中共的宣传。1月30日,时任驻美大使的胡适致电重庆外交部,要求提供皖南事变材料,以便进行宣传。他说:“新四军事件,美国人士颇多疑虑。其左倾者则公然批评我政府……故深盼部中将此事详情及本月初以来之经过,电告本馆,以便随时向美国朝野解释。共军十一月佳电已见,倘蒙将何、白两部长十月皓电及其他重要文件摘要电示,并将全文航寄,至感。”胡适还表示:“共方宣称十四个月不曾领饷械、药品;又称彼以五十万人至今犹领四万五千人之饷云云。此类宣传最能惑乱视听,故切盼多得资料证据以供急用。”<sup>[135]</sup>由此可见,中共的国际宣传颇为有效,而手头缺乏材料、不了解内幕的胡适则是百口莫辩,难为无米之炊。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驻华大使詹森于1月29日向蒋介石声明:“我一向认为共产党问题不应导致大规模的自相残杀的斗争。”2月8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居里访华,在会见蒋介石时也

转述了罗斯福给蒋的口信,罗氏表示希望国共双方消泯歧见,更密切地合作,俾有利于对日本作战的共同目标<sup>[4-13]</sup>。居里还说,美国“闻中国内部发生摩擦,有发生内战之虞者,咸感不安,因而影响其援助中国之热诚”<sup>[36]</sup>。并表示:“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获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助中国,中、美之经济财政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sup>[37]</sup>对此,蒋介石曾在日记中感叹:“美国朝野已深受中共宣传之影响,殊为遗憾。”<sup>[34-2]</sup>其高级幕僚亦深感:“抗战时对共党作战,容易失去国际同情。”<sup>[26-2]</sup>

面对这种四面楚歌的舆论环境,蒋介石已是内外交困。毛泽东即曾总结说:“蒋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我亦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获得如此广大的群众(国内外)。”<sup>[1-24]</sup>为了摆脱窘境,蒋介石不得不慎重考虑,暂时收敛反共势头。1941年3月6日,他在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上表示:

皖南事变“不牵涉党派政治”,保证“以后决无剿共的军事”行动。14日,他又主动约见周恩来,答应解决国共之间的一些具体问题,国共关系开始趋向一定程度的缓和。至此,以皖南事变为顶点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实际上就被打退了。

总之,皖南事变后,尽管国民党的自我辩解曾经俘获了一些人心,但由于中共舆论宣传的方针正确,在斗争中本着“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策略得当,形式灵活,从而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引导着社会舆论的走向,使中共及其军队获得了全国人民的同情和拥护,博得了国际舆论的称赞和声援,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威望。这是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力量的一次大检阅,正如毛泽东所评价:“这次斗争表现了国民党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地位的提高,形成了国共力量对比发生某种变化的关键。”<sup>[38]</sup>

#### [参考文献]

- [1] 中央档案馆. 皖南事变(资料选辑)[C].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142<sup>[1-1]</sup>,170-172<sup>[2-2]</sup>,185<sup>[3-3]</sup>,174<sup>[4-4]</sup>,139-140<sup>[5-5]</sup>,174-175<sup>[6-6]</sup>,198<sup>[7-7]</sup>,152-159<sup>[8-8]</sup>,177-178<sup>[9-9]</sup>,175<sup>[10-10]</sup>,180<sup>[11-11]</sup>,184<sup>[12-12]</sup>,192<sup>[13-13]</sup>,195<sup>[14-14]</sup>,199<sup>[15-15]</sup>,196<sup>[16-16]</sup>,255<sup>[17-17]</sup>,258<sup>[18-18]</sup>,262<sup>[19-19]</sup>,258<sup>[20-20]</sup>,263<sup>[21-21]</sup>,264<sup>[22-22]</sup>,259<sup>[23-23]</sup>,207<sup>[24-24]</sup>.
- [2] 抗战的纪律[N]. 重庆:中央日报,1941-01-18,(1).
- [3] 贯彻军令整肃军纪[N]. 重庆:扫荡报,1941-01-23,(1).
- [4] 《皖南事变资料选》编写组. 皖南事变资料选[C].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376<sup>[1-1]</sup>,379<sup>[2-2]</sup>,316<sup>[3-3]</sup>,384<sup>[4-4]</sup>,441-443<sup>[5-5]</sup>,437<sup>[6-6]</sup>,438<sup>[7-7]</sup>,457<sup>[8-8]</sup>,464<sup>[9-9]</sup>,469<sup>[10-10]</sup>,471<sup>[11-11]</sup>,478<sup>[12-12]</sup>,505<sup>[13-13]</sup>.
- [5] 潘乃穆,潘乃和. 潘光旦文集:第5卷[G].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339.
- [6] 关于新四军事件[N]. 重庆:大公报,1941-01-21,(1).
- [7] 萨空了. 关于《新蜀报》的回忆[J]. 北京:新闻研究资料,1985,(3).
- [8] 周钦岳. 回忆从大革命到抗战时期的新蜀报[J]. 北京:新闻研究资料,1981,(1).
- [9] 肃军与抗战[N]. 重庆:新蜀报,1941-01-21,(1).
- [10] 整饬军纪准备反攻[N]. 重庆:大公报,1941-01-29,(1).
- [11] 再论新四军事件[N]. 重庆:新蜀报,1941-01-29,(1).
- [12] 茅盾. 我走过的道路:下册[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248-249.
- [13] 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 《新民报》春秋[C]. 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34-35.
-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285.
- [15] 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C]. 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17.
- [16] 彭雪枫. 彭雪枫军事文选[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596.
- [17]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 毛泽东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79.
- [1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下卷[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495.
- [19] [美]埃德加·斯诺. 复始之旅[M]. 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288-289.

- [20] 王 泓,等. 周恩来与国际友人[M].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1995:5-7.
- [21] [美]费正清. 费正清对华回忆录[M]. 北京:知识出版社,1991:317.
- [22]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 中国未完成的革命[M]. 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154.
- [23]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C].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138.
- [24] 林美莉. 王世杰日记:上册[M].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325<sup>[1]</sup>,327<sup>[2]</sup>.
- [25] 龚古今,唐培吉. 中国抗日战争史稿:下册[M].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29.
- [26] 公安部档案馆. 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M]. 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188-189<sup>[1]</sup>,377<sup>[2]</sup>.
- [27] 秦孝仪.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2)[Z]. 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386-387.
- [28] [苏]瓦·伊·崔可夫. 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M]. 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57-58<sup>[1]</sup>,56<sup>[2]</sup>,79<sup>[3]</sup>.
- [29]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第19卷[Z].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121.
- [30] [西德]王安娜. 中国——我的第二故乡[M]. 北京:三联书店,1980:361.
- [31] 安徽省文物局新四军文史征集组. 皖南事变资料选[C].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366-367.
- [32] 刘景修,张 钊. 美国记者与中国抗战[J]. 南京:民国档案,1989,(1).
- [33] 张俊义. 皖南事变后蒋介石对美外交余波——宋子文档案解读之三[J]. 北京:百年潮,2004,(11).
- [34] 蔡盛琦.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5册[M]. 台北:“国史馆”,2010:422<sup>[1]</sup>,598<sup>[2]</sup>.
- [35]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胡适驻美大使期间来往电稿[C]. 北京:中华书局,1978:101.
- [36] 秦孝仪.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作战时期:第3编(1)[Z]. 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544.
- [37] 居里重视国共关系,声言国共纠纷未解决,美国无法大量援助中国[N]. 延安:新中华报,1941-03-09,(1).
- [3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778.

(责任编辑 宁 静)

## The Propaganda War between Kuomintang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fter the Southern Anhui Incident

LU Yi

**Abstract:** After the Southern Anhui Incident, Kuomintang(KMT)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carried out a fierce propaganda war. Both sides have made efforts to use public opinion tools to make the situation conducive to its own development. On the one hand, KMT defined the event as a discipline problem, weakening its political color and trying to make quick reconcile. This self justification was not totally ineffective, and to a considerable extent it affects some media. On the other hand, CPC continued to launch propaganda to win sympathy from public opinion, and its foothold was not limited to the incident itself, but requiring for a overall political solution. In this process, CPC's proficiency in propaganda skills was fully displayed. This propaganda confrontation aroused strong repercussions, and KMT finally fell into the plight while CPC greatly improved its prestige. The Incident has thus become a major turning point of political power change in the period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Key word:** The Southern Anhui Incident, Kuomintang,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ublic Opinion, Propaganda

## 阅读此文的还阅读了:

- [1. 国共两党对战俘处理问题之比较——以黄桥战役与皖南事变为例](#)
- [2. 抗战时期国共关系史研究的一部力作——读《皖南事变史论》有感](#)
- [3. 浅论中国共产党应对皖南事变的历史经验](#)
- [4. 营销与宣传战](#)
- [5. 以色列的加沙舆论宣传战](#)
- [6. 从有效性到正义性:试论当代中国共产党宣传战略的变迁](#)
- [7. 皖南事变后周恩来在扭转国共两党态势上的决定性作用](#)
- [8. 再忆皖南事变](#)
- [9. “基地”发动宣传战内幕](#)
- [10. 皖南事变后的国共两党对话](#)
- [11. 叶挺与皖南事变](#)
- [12. 皖南事变后的国共宣传战](#)
- [13. 海峡两岸宣传战](#)
- [14. 皖南事变后的国共对话](#)
- [15. 研究皖南事变的一部力作——《皖南事变史论》简评](#)
- [16. 皖南事变与国共关系主动权的变化——读皖南事变前后中共中央若干文件之再思考](#)
- [17. 试论皖南事变在国共关系史上的地位](#)
- [18. 营销与宣传战](#)
- [19. 中国共产党应对局部冲突的领导经验——以皖南事变为例](#)
- [20. 皖南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
- [21. 明访·暗战:1944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西北之行与国共舆论宣传战](#)
- [22. 论皖南事变后黄炎培对国共关系的认识和善后处理](#)
- [23. 围绕政协会议的国共舆论宣传战](#)
- [24. 新四军与“皖南事变”](#)

- [32. 析皖南事变后国共双方对中间党派的策略及影响](#)
- [33. 图说皖南事变](#)
- [34.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至皖南事变国共关系之我见](#)
- [35. 皖南事变与国共力量消长](#)
- [36. 浅析十年内战时期国共两党的宣传战](#)
- [37. 中国共产党对皖南事变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吸取](#)
- [38. 朱德论宣传战](#)
- [39. 亲历皖南事变](#)
- [40. 我军舆论宣传战萌芽初探](#)
- [41. 试析舆论战与宣传战之区别](#)
- [42. 皖南事变后国共党首会晤失之交臂](#)
- [43. 皖南事变后国共两党的一次高级会晤](#)
- [44. 外军这般宣传战斗英雄](#)
- [45. 试论皖南事变对国共合作产生的冲击](#)
- [46. 1941年苏日签约引发的国共宣传战述论](#)
- [47. 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述评](#)
- [48. 皖南事变与中国共产党应对突发事件能力探析](#)
- [49. 皖南事变国共误判之剖析](#)
- [50. 北伐中的宣传战](#)